

# 家国政治悲剧下的流离

## ——《桑青与桃红》和《广场》之比较\*

吴敏\*

目次:

一, 导言

二, 无备、无奈、无根——相似的历史境遇

三, 南, 还是北? ——选择的困惑

四, “困”、“逃”、“漂泊”——何处是归地?

五, 结语

### 一, 导言

当代著名旅美华人女作家聂华苓是一位有着频繁的迁徙经验,又具有漫长写作历史的多产作家。她经历了抗战时期内迁的流亡学生生涯、渡海抵台谋生和去美工作等经验,在完全不期然的情况下,拥有了横跨大陆、台湾和美国三个不同世界的人生。1949年由大陆去台湾,1960年因编辑进步刊物《自由中国》<sup>1</sup>受国民党当局的迫害<sup>2</sup>。1964年,聂华苓离开台湾,应邀为美国爱荷华(Iowa)大学“作家工作坊”访问作家。1967年,聂华苓和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美国诗人 Paul Engle 共同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sup>3</sup>。这一对为理想不遗余力的夫妇,在1976年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被称为“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sup>4</sup>

聂华苓的作品不算多,但质量厚重,在台湾和海外作家中占有很突出的位置。《桑青与桃红》是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sup>5</sup>,被列入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sup>6</sup>。该书约完稿于1970年,1971年在台湾《联合报》上连载时,因小说中的台湾“阁楼寓言”有影射国民党统治之嫌而遭禁。1974年以后,聂华苓上了警总的黑名单,不能再回台湾。直到1988年,她才冲破

\* 本论文原稿曾在韩国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中山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三届青年学者韩中比较文学国际学术会议”(2008年1月14号)上获优秀论文奖,现又作了较大补充和修改。

\* 吴敏: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miao\\_wu97@hotmail.com](mailto:miao_wu97@hotmail.com)。

<sup>1</sup> 《自由中国》是界乎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个刊物,旨在支持并督促国民党政府走向进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于1949年11月底创刊,胡适为发行人,雷震为实际主持人。雷震(1897.6.15~1979.3.7),1917年加入国民党,担任过国民政府中许多重要职位,离开大陆前是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帮助国民党制定宪法,也曾代表蒋介石参加国共和谈。

<sup>2</sup> 1960年因为“《自由中国》被封”,雷震被捕,入狱10年。也几乎在同时,军警闯进了聂华苓的家。虽没有被捕,但在之后长达2年的时间里,聂华苓都被跟踪,甚至与世隔绝。

<sup>3</sup> 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地作家到爱荷华4个月,写作,讨论,旅行。21年间,世界各地到爱荷华的作家有700多位。在海峡两岸的封闭之际,为两地作家提供了彼此了解、信任、亲近的通道。

<sup>4</sup> 1976年,世界各国三百多名作家曾提名她们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此为倡议书所言。

<sup>5</sup> 之前于1960年出版长篇处女作《失去的金铃子》,台湾,学生书局,1960第一版;1964文星书局第二版;1965第三版;1977第四版;1987林白出版社第五版。

<sup>6</sup> 由《亚洲周刊》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作家联合评选出的二十世纪百部经典华文小说,本书位列第64。

阻碍，再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并出版了此书<sup>7</sup>。而此时的出版，已比香港晚了 12 年<sup>8</sup>，比大陆晚了八年<sup>9</sup>。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该书在大陆的出版也颇费周折，由于小说中有一些不能被大陆接受思想和性描写，故八十年代初在大陆出版的是经过删节的简本。

2004 年聂华苓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三生三世》<sup>10</sup>讲述了她在大陆、台湾、美国三地生活的经历，她在书中自喻：“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她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带给读者深刻的印象。对此，著名作家王蒙评价：“中国人活得太不容易了，别人只能活一生一世，而中国人一生就得经历三生三世的试炼和痛苦。也算福气吧。”<sup>11</sup>《三生三世》正可以与《桑青与桃红》对读，使读者从《三生三世》中了解作者的生平和情感，从而更清楚地理解《桑青与桃红》的隐含意义和背景。

小说《桑青与桃红》中的主人公桑青经历了人生的三次“逃离”：一次是她从老家逃出，被困瞿塘峡；一次是她从北平逃出，困在台湾“阁楼”；之后，又从台湾逃往美国，困在移民局官员的追缉中，并装疯作癫，易名为桃红。小说将古老的流亡漂泊主题、家国动荡分裂的背景、个人生存的际遇、人类永恒的困境、恐惧的情绪体验、20 世纪人类的存在悲剧及其命运思索等内容<sup>12</sup>，通过独特的文本形式呈现出来，因而被公认为 20 世纪“流浪的中国人”身心离散，无根漂泊的寓言和象征。

韩国作家崔仁勋 1936 出生于咸镜北道的会宁，朝鲜战争时期来到南半部，后在首尔大学法学院读书时应征入伍，退役时的军衔是陆军中尉。1959 年开始小说创作，次年发表短篇小说《假面考》和长篇小说（也是其代表作）《广场》<sup>13</sup>，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形成强烈的冲击波。究其原因，与韩国当时的政治情况和文学创作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韩国从日帝统治下获得解放后，就一直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特别是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半岛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巨变。有学者认为，韩国的“‘六·二五’<sup>14</sup>是在现代小说史上无法逾越的最基本的背景。‘六·二五’不仅在 50 年代小说的定性，而且在形成此后文学的基本性质方面也成为间接或直接的原因”，<sup>15</sup>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从停战至 1960 年，焦土和灰烬下饱尝了各种痛苦、疾病、饥饿的人们，由此产生了孤独、愤怒、怨恨、苦恼、绝望等多种情绪，这些情绪都充分反映在了文学作品之中。

当时小说普遍加强了对思想理念的剖析及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伸张，以人道主义的包容性来批判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很多作品还没有超越意识形态的范畴，带有明显的反共意识形态倾向。直到 1960 年“4·19”革命后发表的崔仁勋的小说《广场》，才开始突破以往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转而开始从政治理念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不同于以往一味将战争归因于北边的反共小说，《广场》让人们认识到只有密室没有广场的南方和只有广场没有密室的北方，同样都处于真正的选择范围之外。它表达了战后知识分子企求发现或重新发现自我，追求自由、和谐生存空间的政治诉求，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取得了巨大的文学成就。《广场》成为当年名列前茅的畅销书。其尖锐的理性、对当时独裁和腐败政府的批判，不仅对六十年代的青年人产生影响，而且对八十年代民主化运动中的学子们也依然具有指导价值，因此又

<sup>7</sup> 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台北：汉艺色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 年初版；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97 年第二版。

<sup>8</sup> 聂华苓，《桑青与桃红》，香港，友联出版社，1976 年初版；香港，华夏出版公司，1986 年第二版。

<sup>9</sup> 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北京，青年出版社，1980 年初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 年第二版，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 年第三版。

<sup>10</sup> 聂华苓，《三生三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sup>11</sup> 王蒙，《〈三生三世〉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sup>12</sup> 参见宗培玉，《关于〈桑青与桃红〉的诗学分析》，《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 年 3 月，第 29 页。

<sup>13</sup> 初发表于《清晨》，1960 年 10 月，1961 年单行本出版发行。至今已印刷 120 次之多，有英、法、俄、日、德、中等多种文字翻译本。

<sup>14</sup> 即朝鲜战争，自 1950 年 6 月 25 日到 1953 年 7 月 27 日止。

<sup>15</sup> 李在铤，《战争体验与 50 年代小说》，金允植、金宇钟等 32 人共著，金香、张春植译，《韩国现代文学史》，韩国现代文学编辑部 1989 年初版，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第 284 页。

位列当时的畅销书榜。

有评论家认为，崔仁勋是最会把握文学想象力和政治理念之间相互关系的作家<sup>16</sup>。确实，像《广场》这样，大量运用内心独白和倾诉式表达方式来传达作者哲学思辨的小说，在中、韩都是少数。正因为其强烈的观念性，才使小说有了多方解读的可能。概括各种观点，对《广场》主题的研究，大致有“反映分断之伤痛的作品”说<sup>17</sup>；“反映对立的政治理念”说<sup>18</sup>，“爱才是这部作品的真正主题”说<sup>19</sup>；中国学者朴银淑总结为“在思考、解决民族的分断问题时，应以博大精深的爱来克服理念的对立和矛盾”的“爱和理念”说<sup>20</sup>。

笔者认为，《广场》兼有加缪和海明威式的特点，叙述了站在分裂、战争和落后的悲惨历史面前个人无法对抗的宿命。小说融合了悲观主义、虚无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创作特点，力透纸背地描写了韩国知识分子痛苦思考和抉择的内心世界，可以说，在对知识分子痛苦彷徨心态的揭示上，别的小说无出其右。

崔仁勋以象征主义的叙事手法，用“广场”和“密室”的意象以及自我表白的情节设计，将厚重的历史和个体在意识形态网络中的精神裂变表达得恰到好处。“作品中的浓重气氛，也是尚未找到出路而彷徨的一个时代意识的反映”；“主人公李明俊的逃避，实际上就是整个民族的悲剧”<sup>21</sup>，所以将《广场》归为观念性小说<sup>22</sup>的典范，这种评价是深得三味的。

本文将就两篇小说所反映的时代悲剧、作品内涵，主人公在历史潮流中无奈无根感及无从选择、无所依归的流离命运作一比较，试图探寻民族分裂悲剧下的作家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和对超越理念、寻找和谐生存空间的追寻，以期在后冷战时代以及全球化格局的今天，发掘这些经典之作的当代价值。

## 二，无备、无奈、无根——相似的历史境遇

《桑青与桃红》和《广场》的共同历史背景就是战争，尤其是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它给人带来的伤痛认识是任何其他人类活动都无法比拟的。在文学作品中，战争常常同“远古的沉默”、“亲近夜晚、被死亡支配、小孩儿的受苦、人的禽兽化、精神异常者、时间与残暴等文学想象力相关”<sup>23</sup>。生存的危机、伦理的破灭和历史受难意识等在两作中都有集中的体现。

《桑青与桃红》的故事时间是1945年到1970年。小说以主人公桑青（去美国后更名为桃红）半生越界跨国，无根漂流的人生经历为线索，以明晰、感性而又有些诡异的叙述技法再现了主人公所经历的时代乱象，传递着有关家国政治的思考。小说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其中桃红的信提示主人公当时在美国境内的流浪行踪，桑青的四段日记则记载桑青无根漂泊的经历。日记里的故事发生在四个不同时空：即抗战胜利前夕的瞿塘峡、国共内战结束前夕的北平、50年代末期白色恐怖笼罩

<sup>16</sup>柳宗浩，〈小说与政治〉，《同时代的诗与真实》，首尔，民音社，1995，第265页。

<sup>17</sup>金字钟，〈批判纯粹文学〉，首尔，自由文学社，1989，第216页；林宪荣，〈文学作品对韩国战争的认识变异〉，《分段时代的文学》，首尔，太学社，1992，第195页。

<sup>18</sup>韩奇，〈《广场》的原型性，历史性及现在性〉，《转换期的社会和文学》，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1，第197-216页；金旭东，〈形式主义批评方法〉，《〈广场〉的七种读法》，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01，第150页。

<sup>19</sup>金贤，〈再次确认的爱〉，《文学和伊甸园金贤文学全集4》，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2，第263-264页。

<sup>20</sup>朴银淑，〈广场与密室——论崔仁勋〈广场〉的主题〉，《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

<sup>21</sup>尹柄鲁〈新一代的冲击与60年代小说〉，金允植、金字钟等32人共著，金香、张春植译，《韩国现代文学史》，韩国现代文学编辑部1989年初版，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第340-341页。

<sup>22</sup>这里的“观念”，是作为世界与精神的媒介的观念。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促使两者的对话关系成为可能的精神活动。”参见徐银珠，〈对幻灭的观念性写作——崔仁勋论〉，《20世纪60年代文学研究》，韩国，深泉出版社，1998年，第378-379页。

<sup>23</sup>李在铤，〈战争体验与50年代小说〉，金允植、金字钟等32人共著，金香、张春植译，《韩国现代文学史》，韩国现代文学编辑部1989年初版，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第286页。

下的台岛阁楼、以及六、七十年代相交时的美国独树镇。四段日记就像四个寓言，集中凸现了主人公“逃”、“困”和“漂泊”的流离命运。作为聂华苓的女婿，著名评论家李欧梵先生对本书中隐含的历史厚度给予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认为其史诗般的记录甚至可以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来阅读<sup>24</sup>，因而被认为是作者最具雄心、最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sup>25</sup>。

如果说《桑青与桃红》体现了国家民族身份确认的艰难，“无法递解”的无奈和无根飘零感笼罩全篇的话，那么，《广场》中的无根感则体现在心灵和理念的无所归依，是找不到栖身家园的认同困惑。

主人公李明俊生活在1945年日本投降到1950年韩战爆发前后这一韩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他是首尔一所大学哲学系的三年级学生。父亲倾向于共产主义思想而投奔北边，母亲不久去世，他形同孤儿，只能依靠父亲的挚友——英美父亲的资助以维持学业和生活。他多思、愤世，怀疑既有的价值，苦寻人类存在的意义。他目睹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和弊端，苦苦思索而不得真谛，常有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于是，他只能躲进自己的“密室”，深埋在书本里，从中寻找想要的答案，寻觅那个象征着光明、意义和理解的广场。

但现实却打破了明俊的理想。因为在北边的父亲出现在对南边的广播里，他被警察无端怀疑与其父亲有联络。一夜之间，成了一个政治嫌疑犯，遭受审问和毒打。当他穿着满是血迹的衣服走在汉城大街上时，他对充斥着肮脏、自私，只有个人密室而没有光明的广场的南韩社会已失望到极点。“离开它，去北韩寻找施展个人抱负的新天地”，他抱着这个想法，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意踏上了去北韩的道路。

在新的氛围下，他被安排在各种场合做报告，揭露南韩的黑暗。他真心投入，希望就此开始新的有意义的人生。但不久，他发现，他只能跟着组织的步调随声附和，而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他发言的内容是经组织审查修改过的，都是些言不由衷的陈词滥调。若有不顺的言行，便会被当作批评对象，在党小组会议上遭到攻击。他常被看作是未脱小资产阶级散漫习气的、目无组织、需要帮助的对象。来到北边半年后，明俊仿佛听到了广场中铜像轰然倒塌的声音，他的希望破灭了，在强调复唱的、令人窒息的空气中，他陷入了极度的困惑和痛苦之中。这种痛苦，是丧失自我的整体性，是脱离自然的扭曲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孤独所引起，也与日复一日的陈腐日常生活有关。

### 三，南，还是北？——选择的困惑

南，还是北？在不同政治理念下，面对民族分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不得不出自己的选择。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们连这种选择的自由也没有。李明俊是这样，桑青更是如此。

《桑青与桃红》所述的第二个寓言，即国共决战前夕的北平城内，纷纷乱乱中，选择留下迎接共产党的军队，还是逃离南下，继续跟随国民党，聂华苓以一连串的场景和对话，表现了他对任何军队和领袖都一概反对的无政府主义观念<sup>26</sup>。

“你们这些学生，无法无天！”家网站在上房门口大叫：“你们占了南屋，现在又占东厢房了！政府规定强占民房者要以法严办！”

“告诉你，北平城有二十几万军队。又有三、四百犯人释放了！一家人住一幢四合院的日子过去啦！”

<sup>24</sup> 李欧梵在〈重划《桑青与桃红》的地图〉一文中也持此观点。见《桑青与桃红·序》。

<sup>25</sup> 白先勇认为：“这篇小说以个人的解体，比喻政治方面国家的瓦解，不但异常有力，而且视域广阔，应该算是台湾芸芸作品中最具雄心的一部。”见白先勇，〈流浪的中国人〉，《第六只手指》，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第85页。

<sup>26</sup> 许燕：〈跨境传播与身份差异——美华文学在大陆语境被过滤的作家因素分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第3期。

……

“喂！喂！那两箱古董字画是别人郑家祖传的东西呀！别扔在院子里呀！”

“对不起！天太冷了！咱们要生火！”

流亡学生来来往往把行李搬进东厢房。

革命的风暴倏然而至，侵入了传统保守的四合院。这里已隐约可见作者对不尊重个人私有财产和私人空间的反感。

院子里到处是毁坏的古玩字画。“长江万里图”撕破了撒在地上，竹雕笔筒裂了口。青花斗彩葫芦瓶破成了两半。挂轴、字帖、经书有的溅了泥，有的撕破了。只有院子角上一尊泥塑的“愚公移山”还是完整的……轰的一声炮响。大门震开了。风沙卷进来了。片片长江在四合院里飘起来了。

几个场景和对话，隐含了作者对撕裂传统，割断文化的惊恐和不安。文中的“寓公”因毛泽东著名的《愚公移山》一文而有了指涉性：共产党来了，要改天换地、改朝换代了。作者以“片片长江”指代民族国家，“片片长江在四合院里飘起来了”则暗指中国古老的山河又一次破碎了。由此可见作者对共产党政权的恐惧和负面的感情。

这种对共产党政权的恐惧与反感心态，与作者的家庭遭遇有关。聂华苓的父亲在 1934 年曾当过 8 个月的贵州某行政区的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因此在与共产党的冲突中被杀。聂华苓承认，自从她父亲被“办理”以后，她便对革命、对共产党怀着恐惧的心理。再加上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艰难中度过，贫穷的旧中国在聂华苓心上投下了极为浓重的阴影，这使聂华苓的作品始终带着反政治的基调。反映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对随后共产党政权强调个人服从国家、“一切交给党”而没有私人空间的批判。

质言之，这种否定情绪其实是对政治和战乱的恐惧。它还集中体现在聂华苓设计的战乱中婚礼场面的描写上：沈家老太太在解放军围城的惊恐中死去，这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老太太临死前，还要家刚和桑青举办婚礼。婚礼本应是吉祥、美好的，预示着新生活的开始，然而乱世中的婚礼，却充满着怪诞和不安。怪异的婚礼、不祥的洞房之夜，都象征了离乱中的中国人命运的多难。我们从证婚人万老大爷的致词中，可以看到作者所揭示的时局的滑稽和荒谬，以及作品所蕴含的讽刺性：

“……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倾国败家者，不计其数。因此家纲之德在此乱世尤为珍贵。而家纲之德又归功于孟母第二”；“……伪代总统李宗仁发表文告，说：在八年抗战之后，继之以三年内战，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庐舍悉遭摧毁，无辜人民之死伤成千累万……”

将“国之乱臣”、“家之败子”与李宗仁的文告并置，也就是将外侮内乱、山河破碎隐喻为“倾国败家”之人，对比中产生讽喻效果，其批判色彩是十分强烈的。

这种批判和讽刺的力度在《广场》中也分明能感觉到。明俊的父亲是“民主主义民族统一战线”中央的宣传负责人。当明俊来到北韩后，他在那里看到的是在现实面前将理想拱手相让的、丝毫不象革命家的父亲。在忍无可忍之下，他第一次与父亲发生了争吵。他向父亲倾吐了对北边社会的否定和批判，认为北韩的体制是对“革命的模仿”和传播“关于信仰的风闻”。在人民的表情上看不到革命带来的由衷的喜悦，只有呆板和木纳的表情。这是一个“个人欲望被禁止的地方”，是一个灰色的共和国，人们不是虚伪，就是麻木。在退色的标语和缺乏人道主义色彩的组织生活中，他见到的是放弃个人应有权利的党员和无法拥有个人密室的大众：

“我不是主人公而只有党是，只有党兴奋和陶醉。我们只有附和。由党来思想、判断、感觉、叹息，只让我们附和。——到了北边我才知道，就一般市民或工人、农民都有这种生活感情。他们不关心。他们只是袖手旁观。他们是被人牵着的。他们像鹦鹉一样只是跟着喊口号。”<sup>27</sup>”

两位作者都否定了强调复唱而忽视私人空间的广场，对共产党统治下的北平和北韩产生了疏离。那么，他们对只有密室而没有广场的台湾和南韩又是如何看的呢？

台湾由于奉行反共政策，政治上禁忌很多，人们就像生活在阁楼中一般，稍不留意就会被投入监狱失去人生自由。作者精心打造的第三个寓言——台湾小阁楼，正是白色恐怖笼罩下台湾的影射。因为，随着 1949 年国民党退居台湾，台湾成为国民党政府政治流亡的“宝岛”。对于随国民党政府迁台的人来说，他们的离乡背井大多是出于无奈的政治选择或政治裹挟的结果，带着政治放逐的意味，失落孤绝感在所难免。因此，那座濒临倒塌、尘埃满布、老鼠横行、时钟停顿的阁楼，便“很恰当地象征着台湾本身恐惧孤独、暂与外界隔绝的情况”<sup>28</sup>。小说中，作者作了一个很出色的比喻：“台湾是一只绿色的眼睛。孤零零地漂在海上。”<sup>29</sup> 孤零零地漂在海上的眼睛和阁楼都象征了台湾当时“困”的处境。

困在阁楼中，主人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心里编织不同版本的逃亡寓言并收集颇具梦魇色彩的报纸新闻，如僵尸吃人、荒山黄金梦、三峰真传固精术，故都风物等。这很恰当地象征了台湾本身的摇摇欲坠、暂与外界隔绝的境况，以及逃亡者偏安于台湾而产生的恐惧孤独、朝不保夕的心境。为此，作者设置了掌上对话、图画配文字、剪报、抄写《金刚经》等情节，表现了特殊情境里人物的自我表达和欲望发泄的本能要求。

作者以家纲枕头旁边的剪报为道具，从中撷取几个典型片断，无不影射台湾的社会现实：如“假药、黄金梦”的新闻，隐喻了台湾物欲膨胀的现实；“自掘坟墓、绯闻、分尸”等丑闻，则是台湾依靠美国取得政治苟安，在经济转型后，因民族自尊和传统受伤害而出现混乱、暴力、道德沦丧等现实的浓缩；“僵尸吃人故事”的鬼魅，成功隐喻了国民党入台初期，官员贪赃枉法、政治恐怖横行、小民恐慌不安的极不稳定的台湾社会现状。还有“共谍传闻”等，则体现了反共戡乱的恐怖政治氛围。

这些片段的新闻、传闻共同构成了台湾社会的纷乱现实，反映了战后台湾恐怖政治和世俗社会的众生相。

生活在相同的反共、恐怖、没有自由的政治氛围下的崔仁勋，也同样对韩国社会只有个人的密室而没有公众广场的现实，进行了犀利的批判。

“韩国政治的广场堆满了污秽和垃圾。本属于大家的花草折回来插在自家的花瓶里、把公用喷水池的喷嘴儿拧回来安在自家的厕所里、用人行道上的砖块儿铺垫自家厨房的地板。韩国的政治家们到政治广场时，扛着斧头和铁锹，带着口罩是出来偷盗的。

“流洒鲜血的，冷清的广场升起黑色的太阳，傍晚被染成血色落下去。那是邪恶的广场，是贪婪、背叛和杀人的广场。难道这不是韩国政治的广场吗？”

“……韩国经济的广场在欺诈的烟雾中放着威胁的烟花，飘荡着虚荣的广告气球。什么文化广场？到处绽开着谎言的花朵。……对这种广场人们只有不信任。他们最珍视的只有他们自己的房间，也就是密室。……密室里很丰盛，广场却消失了。……需要的掠夺和欺诈一结束，广场就空无一人。广场死去的地方不就是南韩吗？广场是空的。”<sup>30</sup>

<sup>27</sup> 翻译参考了崔仁勋著，陈宁宁译，《广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第 28 页，并根据大陆的语言习惯稍作修改。

<sup>28</sup> 聂华苓，〈浪子的悲歌（前言）〉，《桑青与桃红》，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第 1 页。

<sup>29</sup> 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第 132 页。

<sup>30</sup> 崔仁勋著，陈宁宁译，《广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第 28-29 页。

从明俊与考古学家郑先生的交谈中,可以看到明俊对南韩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厌恶和批判。他觉得那里只有邪恶、贪婪和谎言,没有了正义、清廉和真实。广场本是民众聚会、活动的充满阳光的空间。在南韩却成了邪恶、虚荣和充满谎言的死亡的广场。他们用从广场偷盗来的东西装饰着自己的密室。因此,民众的广场消失了,但偷盗者的密室却很丰盛。明俊认为,南韩所谓的自由民主主义不过是装饰门面的,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

于是,两作的主人公都想逃离,而这种逃离其实是整个民族的悲剧,是尚未找到出路而彷徨的一个时代意识的反映。

#### 四,“困”、“逃”、“漂泊”——何处是归地?

“困”、“逃”和“漂泊”,是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文学界经常涉及的写作母题,它反映了大战后人们对人类理性的不信任,对物质文明带来的破坏力及由此产生的不安、恐怖与绝望等情绪。站在虚无前,在失去神和人生原则的精神废墟上艰难生活的人们,意识到生存的艰难,想“逃”而不得,始终处在“困”境之中,于是,开始对人类存在的意义发出拷问。这种存在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遍回响。

50年代中后期,海德格尔、雅斯贝斯、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以及尼采、叔本华、柏格森、狄尔泰等生命哲学家的思想大量介绍进韩国和台湾,在五十年代荒废不堪的知识界风靡一时,作家们否定理性发展的历史,自觉地将文学创作与否认人性、看透人生之偶然性与不合理性的存在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

桑青(桃红)就始终身陷“逃”、“困”和“漂泊”的漩涡中。比如第一个寓言,在日本侵略的战乱中离家的桑青被困在长江上一艘搁浅的小船里,他们想逃走,却日日夜夜陷入绝望的等待中。这时,作者特意安排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分析时局的重要人物——老先生,借他之口反思了中国历史:

“咱们就困在历史里呀!白帝城,八阵图,擂鼓台,孟良崮,铁索关!这四面八方全是天下英雄奇才留下来的古迹呀!你们知道铁锁关吗?铁锁关有拦江锁七条,长两百多丈,历代帝王流寇就用那些铁索横断江口,锁住巴蜀。长江流了几千年了,这些东西还在这儿!咱们这个国家太老太老了!”

老先生理智上认为传统已经构成了对现代中国发展的阻碍,但情感上又充满对昔日辉煌的留恋。而年轻一代的流亡学生则以青春的本能疏离古老的传统并渴求着新生:“现在不是陶醉在我们几千年历史的时候呀!我们要从这个滩上逃生呀!”传达了在危机中求生存的当时中国的真实境遇。

在解放军围城,准备和国民党决战时,去北京与家纲完婚的桑青又想出逃,作者以家纲之口抗议:“我是不逃的。上次打仗是中国人打日本人。这次是中国人打中国人。逃到哪儿也还是中国人!”表达了又一次卷入战乱的无奈以及对时局和内战的批判。但他们终究还是选择了逃亡。

“从天津一路同车的男女十二人,一个个拎着行李走到栈房。

十二个陌生人,睡在一张大炕上。我一边靠墙,一边靠家纲。十二个人全不讲话。我已经六天没讲话了。我非讲不可了。我把家纲的手从被子里拉出来,在他手掌心画字。我们就在手掌心上谈话。”

这种手掌谈话的非常态行为到了台北阁楼中竟成了主人公生活中的常态。作者以日记形式,述说了1957年夏——1959年夏两年时间的阁楼生活,沈家纲因亏空公款而被通缉,桑青一家三口不得不躲避于阁楼。由于阁楼低矮,他们只能在室内爬行,而他们的女儿桑娃明

明可以站立行走，可她偏要学大人的样，习惯了爬行。异化的环境产生了异化的人，而新一代的异化成长方式更暗喻了毫无希望的前景。在这种狭小的空间里，置身于极不自由的环境，人物的焦虑感和幽闭感进一步加剧，每个人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精神变异。他们只能用火柴谈话；在旧报纸上谈话；用火柴和孩子游戏。

困在阁楼中，主人公满脑子想的是逃亡，于是：

“我在过去一年中不知不觉收集了许多逃亡的故事。一大叠剪报就在我的榻榻米上。……作恶难遁形。偷渡亦枉然。鹞远线长。鼯泉末路。大流氓俯首成俘。……我在阁楼里写那样子的逃亡故事：逃亡山上，逃亡海上……再如何逃法呢？”

体会着人生的无意义，时光在阁楼中流逝、停滞了，就像家纲那口始终在修却永远修不好的时钟。桑青在旧报纸上和他手谈，让他停止，但他不同意：

“我必须修。”

“在阁楼时间没有用。”

“钟停世界就停了。”

“世界不会停。钟修好了也还是围着圆圈打转，停了也罢。”

困在阁楼中，空耗着时间和青春，却终日无所事事。存在主义的人生无意义感在此隐约可见。而在这样的虚度中，有一阵主人公还相当满足。

“我过惯了阁楼生活。在阁楼里，一切贪嗔渴爱都没有了。只有阁楼才安稳一些。”

然而，这样的自求安稳是短暂而不可多得的，在现实中随时会被打破。明俊也曾试图牢守个人的天地，以为很安全，但是，不期然间，它已被粗暴地侵犯和践踏了。当明俊在警察局的审讯室里毫无理由地受到怀疑、责骂和毒打，看到从自己的鼻子里流出鲜红的血块时，他的胸中燃起了熊熊火焰。他清醒了，也明白了：原来，离自己很远的父亲事实上就在自己身边。他虽然表面上对政治和社会漠不关心，但这并不能保护自己。“他们并不忌讳一名市民前襟沾满了血走出警察署大门”。所谓的民主、法律被剥掉了伪善的外衣，露出了虚假和丑陋。以往的信念轰然倒塌——密室并不安全，警察随时可以侵入，可以像碾死一只蚂蚁一般地让一个人消失。

明俊意识到这里不仅没有公众的广场，本应该受到保护的密室也不再有了。他失去了自己的存在空间。这种令他窒息的气氛和环境，对南韩的现实社会具有的幻想的破灭，迫使他逃到别的地方寻找寄托。

“我逃离南朝鲜并不是因为想念父亲。也不是害怕无知的刑警的拷问。——我只是想活。想燃烧青春的火焰。想拥有真正的生活。在南边的时候，我怎样寻找也找不到使我深感人生价值的广场。”

但是，他在北方依然没有找到自由呼吸的空气，“困”在人云亦云的理念教条中，北韩同样是个令人窒息的环境。唯有女友恩惠的柔情和关怀，才使他保有暂时的温馨和有限的自由。恩惠是个拥有美好心灵的舞蹈演员，她热爱自由，并未受政治立场的深度感染。她深爱明俊，但不赞成其知识分子的忧郁感，她成了明俊的依靠。但是，这样的状态也没能维持多久，恩惠还是应工作需要背着偷偷去莫斯科演出，而他则带着受伤和失落的心随命运沉浮。

战争开始后，在共产党占领汉城期间，明俊作为情报军官回到了这个城市。在洛东江战



役中，对生存本身不寄什么希望的明俊，偶然地和已成为战地护士的恩惠再次相遇，这给他的生活又带来了生机。他们在洞窟里享受爱情的甜蜜，并有了爱情结晶的喜讯。这个洞窟仿如他们的“密室”，尽管带着不安和内疚，他们还是在这里享受了战乱中的暂时安宁。但正如白色恐怖下的阁楼是不安全的，战乱中的密室或洞窟同样也得不到安全和保障。这是战争或理念对立状态下人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恩惠死于美军的轰炸，他们在洞窟里的短暂爱情也旋告终结。恩惠的死告诉他：在这块土地上没有可以和谐生存的地方，哪里都找不到安全的容身之所。明俊成了心无所归之人，不久也成了对方的战俘。战争结束后，当被询问将选择哪里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时，他坚定地选择了离开这块土地，去第三方中立国。因为他深信，不管南韩还是北韩，都没有广场和密室和谐共存的地方，更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处。于是，他又选择了流离和漂泊，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逃亡——不得不离开故土的逃亡。

桑青和李明俊始终处于身和心的漂泊中，最后都被迫离开本土，走上了离散和漂泊之路，去第三国生活。桑青去了美国，而李明俊则选择了中立国，登上了象征和平与爱的“泰戈尔号”客船。读者不禁会问，选择了第三国，他们就能找到理想中的新天地吗？

聂华苓称自己的这部作品为“浪子的悲歌”，其实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桑青再度逃亡，逃向“自由者的天堂”美国，由于签证过期非法居留，又遭到美国移民局的缉捕。至此，桑青已无处可逃，更无家可归。为了求存，她易名桃红，改变身份，否认以往全部自我，跟美国警察展开了一场捉迷藏式的捕逃持久战。在美国独树镇，桑青的日记记载了身心离散的中国人身份确认的艰难。虽然远离了国内的政治对立，但他们依然不能回避选择的拷问。美国警察人员对于桑青及其亲朋有关国共、“左”“右”身份的辨析讯问就反映了冷战时期华人移民必须面临的恶劣处境：如不能通过调查，桑青将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而遭递解出境。小说中提到，每当问及中国人将选择何处作为递解出境的目的地时，他们大多会茫然地回答：“不知道。”因此，桑青日记中对此有这样沉痛的自语：“中国人是没有地方递解的外国人。这是他们调查其他国籍的外国人所没有遭遇到的困难。”小说人物的命运永远和国家的政治悲剧和冷战的色彩联系在一起，难以抹去。

李明俊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甚至还到过南满洲、南支那海等地，但都未能解脱理念的羁绊，始终被“困”在现实中。虽然后来他踏上了去中立国的客船，但仍无法摆脱既往的烙印，他只想在一个谁也不认识自己的地方自由随意地生活，但是，最终他意识到在中立国的平凡生活也不过是没有意义的生命的延续，他依然苦恼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桑青一样，都是有家难回，有国难投的流亡者，他们都在寻找生命的归宿。在小说最后，当李明俊与尾随而至的象征恩惠和女儿的两只海鸥面对面时，他的所有困惑似乎豁然解开了。他看到了由爱筑起的绿色的广场，可以自由俯冲和飞翔的广阔大海一般的广场，这就是他所追求的人类和谐生存的环境。他跳入大海，尾随两只海鸥，实现了和自己所爱的人幸福、自由地飞翔在绿色广场的心愿。

李明俊通过对超越南北韩政治体制的第三条途径的探索和自己的死，表达了对公众的广场和个人的密室和谐共存的社会和生活的渴望。

作家的不同经历和美学旨趣，形成了不同的结尾处理：明俊的自杀传递了一种控诉，而桃红的流浪，表达的是顽强求生的姿态。两作最终的目的是趋同的，那就是为了追求更适合生存的地方，不管身在何处，总有一个人们共同的精神向往地。它或许就在政治对立趋向缓和、价值观念渐渐趋同，生存环境超越意识形态而趋向自然、和谐、独立、自由的境界里，就象大海上自由翱翔的海鸥。或许，这就是两位作家所传达的共同的希冀。

## 五、结语

综上所述，这两篇经典之作可以视为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寓言。虽然它们的写作年代、政治背景、作家气质和写作风格各有不同，但在这些表面的差异下，又有着内在的、精神上

的相通性：由于战争和意识形态分断，两作的主人公都有着家国政治悲剧下流离的命运，都身处“逃”、“困”和“漂泊”的生存困境，都在苦苦思索人类生存的本质问题，并且将之置于国家、民族的分裂状况下进行思考。它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谁都需要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密室”，同时也需要一个与他人交流、传递彼此信息的“广场”。但是，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在他们的生存现实中，都没能找到“广场”与“密室”彼此和谐的归宿，身心离散构成了他们生命的基本境遇，始终处于“在路上”的困境。

桑青始终在“逃”与“困”的生存状态下挣扎，漂泊中失去了赖以依存的民族传统之根，最后精神分裂，改名为桃红。但在绝望中，她仍继续顽强地“行动”着，寻找着合适的生存土壤。这种困境和挣扎是人类在动荡险恶的生存环境里艰难寻求生存的象征。

李明俊也没能摆脱南北韩理念的束缚，和千千万万人一样成了对立政治理念的牺牲品。这其实就是人类在 20 世纪所面临的困境之一。李明俊用自己的死向世人昭示：以任何名义为理由的人或思想，都没有权利践踏人的尊严，剥夺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任何以牺牲人之尊严和幸福为代价的理念，都是没有意义的。

《广场》主人公以死摆脱困境的结尾，其实不应视作对现实的逃避，相反，应当视为奋不顾身追求和谐生活的行动。犹如凤凰涅槃后的重生，是以旧我的毁灭来呼唤新生。从这一点来讲，李明俊决绝的“死”和桃红顽强的“生”是同质的，他们都以存在主义式的“行动”方式表达了对绝望现实的反抗。

崔仁勋的《广场》问世已经四十多年了。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作者未能对历史和南北韩政治社会作更有深度的认识和解剖，且太执著于个人的自我理念。但时至今日，它所具有的现实性和历史意义却没有丝毫褪色。东亚这两块依然分裂的土地，虽然已有了某种松动的迹象，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对立，仍未使这种状态有丝毫实质的改变。站在 21 世纪的新起点回望过去的历史，审视国家民族曾经的伤痛，或许能更深入地体察人类求和谐求安宁的共同心声。

歌德说过：“诗是人类共同财产”<sup>31</sup>。本文将两篇不同地域却表达相同诉求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目的就是为跨越和打通某种既定的界限，在比较中发掘文学艺术审美的特质和共性。这是一种对话，这种对话将促进不同文学间的交流、沟通和比较，达到不同审美观念的互相确认、互相了解、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就有了越界对话的可能性。

随着人类在地球村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民族都被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世界的潮流中而不可能孤立存在。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再来阅读这些逃亡和离散的痛苦经验，除了战后格局中的创伤记忆外，我们应当超越政治社会的僵硬视野，更深入体味其对生命本体意义与价值的苦苦探索和追求，深刻认识到人的生命、尊严、幸福才是唯一最重要的，并以此为基础追求全人类的和谐、幸福，使地球村成为“广场”与“密室”共存的乐园。

文学需要在更广阔和深邃的领域里探究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因此，有必要站在世界乃至人类的角度，对这两部经典小说进行普遍意义和价值上的发掘。这正是本文抛砖引玉的目的所在。

## 参考文献：

崔仁勋著，陈宁宁译，《广场》，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

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金允植、金宇钟等 32 人共著，金香、张春植译，《韩国现代文学史》，韩国现代文学编辑部 1989 年初版，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金柄珉、许辉勋、崔雄权和蔡美花共著，《朝鲜——韩国当代文学史》，北京：昆仑出版社，

<sup>31</sup> 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13 页。

2004

许燕, 「跨语境传播与身份差异—美华文学在大陆语境被过滤的作家因素分析」,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05 年第 3 期。

李丽, 「一曲‘浪子的悲歌’」, 《华文文学》, 2004 年第 4 期。

(美) 朱邦尉, 「从根的失落到根的回归」,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1999 年第 2 期。

朴银淑, 「广场与密室——论崔仁勋〈广场〉的主题」, 《外国文学研究》, 2005 年第 4 期。

朱立立, 「女性话语·国族寓言·华人文化英雄——从文化研究视角重读当代华语经典《桑青与桃红》」, 《台湾研究集刊》, 2006 年第 3 期。

宗培玉, 〈关于《桑青与桃红》的诗学分析〉,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5 年 3 月

김미영, 《최인훈 소설 연구》, 깊은샘, 2005

千二斗, 「密室和广场」, 金炳翼、김현共编《우리시대의作家研究叢書》3, 은애, 1979

## **Homeless in the tragedy of family, country and politics ——omparing "Sang Qing and Tao Hong" with "Square"**

**Wu Min**

### **【ABSTRACT】**

Choi Inhun, a South Korean writer, wrote the novel "Square" in 1960. Nie Hualing, a USA citizen of Chinese origin, wrote the novel "Sang Qing And Tao Hong" separately in 1971. Although there are exterior differences in the writing age, the political background, the writer habitude, the writing style, these two novels have interior and spiritual interlink. As a result of the war and the division of ideology, the two dramatis personae has the same fate—homeless in the tragedy of family, country and politics, living in pretty pass-- “running away”, “being stranded” and “drifting”. With the effort of thinking hard and seeking hard, both of them againsted the desperation and vanity by the way of “existentialism”. By the way of comparing the intercommunity and otherness of the two novels, the thesis shows the common political demand within Chinese nationality and South Korean nationality. The two novels had tran-national and tran-Cultural human universal significance, when expressing the thinking and seeking to harmonious living surround.

KEY WORDS: Sang Qing And Tao Hong ; Square ; Sanctum ; Conception ; Symbol